

## 出版史研究

## 陳弘謀刻書考--兼談東海館藏陳弘謀《近思錄集解》刊刻與著錄

郭明芳\*

《東海大學圖書館館刊》第三期刊有館藏古籍整理之作，〈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〉(頁 80-97)，首《近思錄集解》，其版著錄作「清乾隆年間(1736-1795)陳弘謀重刊本」。又同期有鄭丹倫君〈東海圖書館藏陳弘謀重刊近思錄集解板本概述〉(頁 16-29)一文，考論精詳，說明此書著錄源由。該文中，於館藏版本時間則根據陳氏〈重刊序〉並相關傳記資料，推測「刻於雍正十一(1733)年至乾隆二(1737)年之間」，刊刻地或許在雲南云云。又檢歷來各館於著錄此書，或著錄作「桂林陳氏培遠堂」。針對此點，筆者撰本文，以為補充說明。

陳弘謀(1696-1771)不僅是儒臣，他也是刻書家，透過刻書傳播儒學與流通文獻。而作為文獻家的陳弘謀，其刻書事蹟，不管清末葉昌熾所編著的《藏書記事詩》，還是當代鄭偉章所編著的《文獻家通考》等書皆失收，無有半字。現通過本文考察東海館藏《近思錄集解》版刻問題，又蒐羅有其刻書材料，一併附綴考論之。

## 一、《近思錄集解》刊印時地考

北大藏本《近思錄集解》書影<sup>1</sup>東海藏本《近思錄集解》書影<sup>2</sup>

\* 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<sup>1</sup> 檢索自「苑苑汲古」資料庫，網址：<http://rbsc.calis.edu.cn:8086/aopac/jsp/indexXyjg.jsp>。

根據北大館所藏同書，則有扉頁，作「乾隆元(1736)年重刊。近思錄集解。培遠堂藏版」。核之此本版刻，每半葉九行、十九字、白口，單黑魚尾，卷末有「桂林後學陳弘謀重較刻」等項，與東海本同版則無疑義。「弘謀」與「培遠」劃亦字義上亦相合。因此，東海所藏者至少可訂為乾隆元(1736)年培遠堂刻本。

另檢索各館著錄或著錄作「桂林陳氏培遠堂刊本」。又檢陳氏〈近思錄集解重刊序〉稱：「弘謀服膺此編，攜之篋衍，近見滇中罕所流布，因出以重付梓。」再檢《清史稿》本傳載，「(雍正)十一(1733)年，擢雲南布政使。…三(1738)年，授宏謀直隸天津道。」據此可知，雍正末至乾隆初，宏謀任職雲南，與序文合，是書刊於雲南是可確定的。此書自明中葉以來，各地皆有刊本，雲貴居邊遠，各書流通不廣，陳氏取以重校刊於雲南，亦有俾於提振雲南學風。

又因為此本《近思錄集解》於避諱方面已避弘曆之諱，時已乾隆元(1736)年，不可能是一般書坊所刊。蓋帝位更迭之時，於新增避諱字方面，官署較之民間更能較早反映之故。

因此，此本應是陳氏在雲南官署所刊，而掛自己之齋名，其著錄應作「乾隆元(1736)年陳弘謀培遠堂雲南刊本」。

## 二、陳弘謀刻書並考論真偽

陳弘謀好刻書，前述葉昌熾或鄭偉章之書皆無一字說明。現僅查得瞿冕良編著之《中國古籍版刻辭典》<sup>3</sup>，其中有「培遠堂」一條有提及，其云：

清廣西臨桂人陳弘謀(1696-1771)的室名。宏謀字汝咨，號榕門，雍正元年進士，曾歷任陝、湘、蘇等省巡撫、湖廣總督，有《培遠堂稿》等。刻印過宋司馬光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》80卷、《目錄》2卷、《附錄》1卷、《年譜》1卷(蘇州校刻本)，顧錫疇編《綱鑑正史約》36卷，自編《天章匯錄》不分卷(活字本)，自輯《大學衍義》6卷，又《大學衍義補輯要》12卷，自輯《呂子節要》4卷，又《呂子節錄補遺》2卷，自撰《四書考輯要》20卷，又《培遠堂文檄偶存稿》48卷等，道光十七年(1837)其後裔們仍以「培遠堂」名義，刻印過他的遺著《培遠堂全集》269卷。(頁 757)

瞿著有前、後版之分，然論述皆同，未有增添。而論述中或輾轉抄錄，資料堆疊，未加考據。今以此為基礎，重為考論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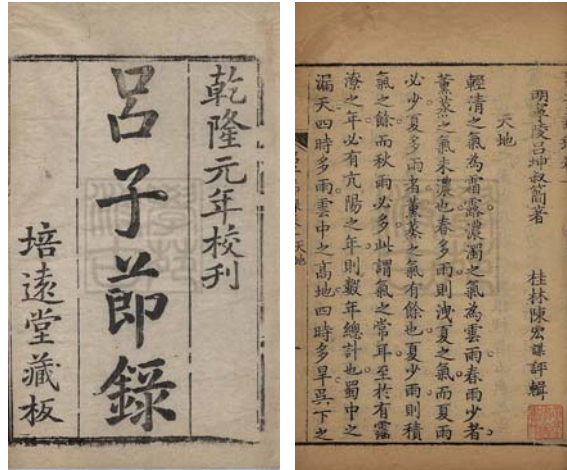
---

<sup>2</sup> 書影引自〈館藏徐復觀先生贈線裝書簡明目錄〉一文。

<sup>3</sup> 蘇州市：蘇州大學出版社，2009年2月。

## (一)雲南時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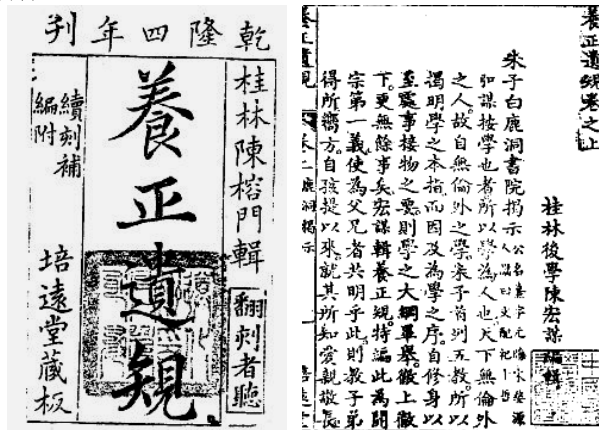
陳弘謀任職雲南期間，刻有《近思錄集解》。除此之外，亦刻有其他書。以所知，如藏於北大館的《呂子節錄》即是。此書扉頁作「乾隆元(1736)年校刊」，文字亦與《近思錄集解》同。



北大館藏《呂子節錄》書影

又據《清史稿》本傳載，於雲南「立義學七百餘所，令苗民得就學，教之書，刻《孝經》、小學及所輯《綱鑑》、《大學衍義》，分布各屬。其後邊人及苗民多能讀書取科第，宏謀之教也。」以上所見其所刻之書，今已無法見原本，所見者多為書坊翻刻而掛弘謀之名。又其所輯之書亦同。

## (二)天津時期

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所收《養正遺規》書影

乾隆三(1738)年渠轉任官天津，隔(1739)年亦有刊印《養正遺規》。《養正遺規》，乃陳弘謀所刻《五種遺規》之一。此本序署稱「乾隆四(1739)年三月

既望桂林陳宏謀題於津門官舍」，此據中國社科院圖書館藏一種(今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第 951 冊)，其字體與乾隆元(1736)年《近思錄集解》亦頗類似。

又，此時陳弘謀為避弘曆之諱，已經自己的名字，從「弘」改作「宏」。

至於《五種遺規》之其他四種，則分別在他在往後任官歲月間，分別刊印，此不贅述。於此，或可見陳弘謀所刻書，其字體屬於軟體字。

附帶一題者，由於陳所刻《五種遺規》有裨於政教，清中葉已降，以迄晚清官書局或書坊亦有重刊。例如說北大館藏一部《五種遺規》字體屬於「橫輕豎重」書坊慣用字體，亦署「培遠堂」(版心下緣亦有「培遠堂」字)，然此時陳弘謀已逝，應書坊或好事人掛名翻刻者。



北大館藏道光十年《五種遺規》之《從政遺規》書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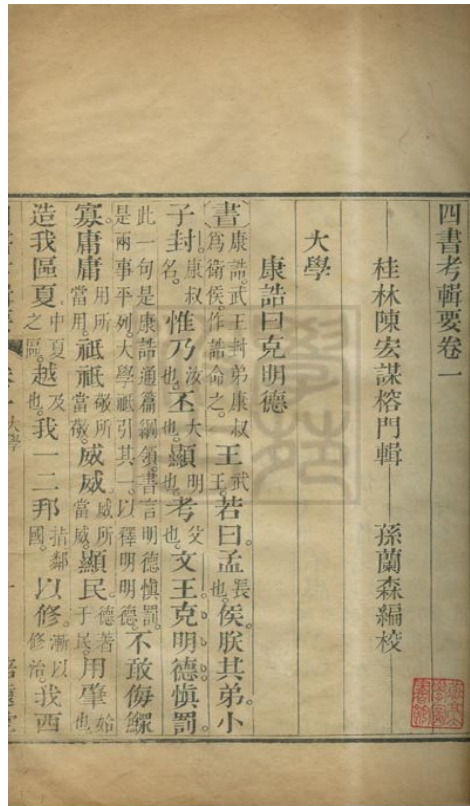
又廣州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藏光緒間《五種遺規》，版心雖有「培遠堂」，但字體與時間不符。又《訓俗遺規》葉一「訓俗遺規卷之一」字下有「□堂藏版」，亦可證明為書坊所刊。



中大館藏光緒《五種遺規》書影

此類翻刻，多掛「培遠堂」之名，實際上，筆者認為應有兩種情形可以討論，一是書坊與陳弘謀齋號同。換句話說，書坊名「培遠堂」，即與陳氏無涉。如山大藏康熙五十二(1713)年培遠堂藏版的《尺木堂綱鑑易知錄》，即是書坊而非陳氏書齋。

第二種情形，乃為後世好事之人或其後裔所為。此部分很難有任何明確證據證明何者為何者。現僅能不歸之陳弘謀所刻之書之列。此類例子不少，如北大《四書考輯要》一書。



北大館藏《四書考輯要》書影

### (三)江南時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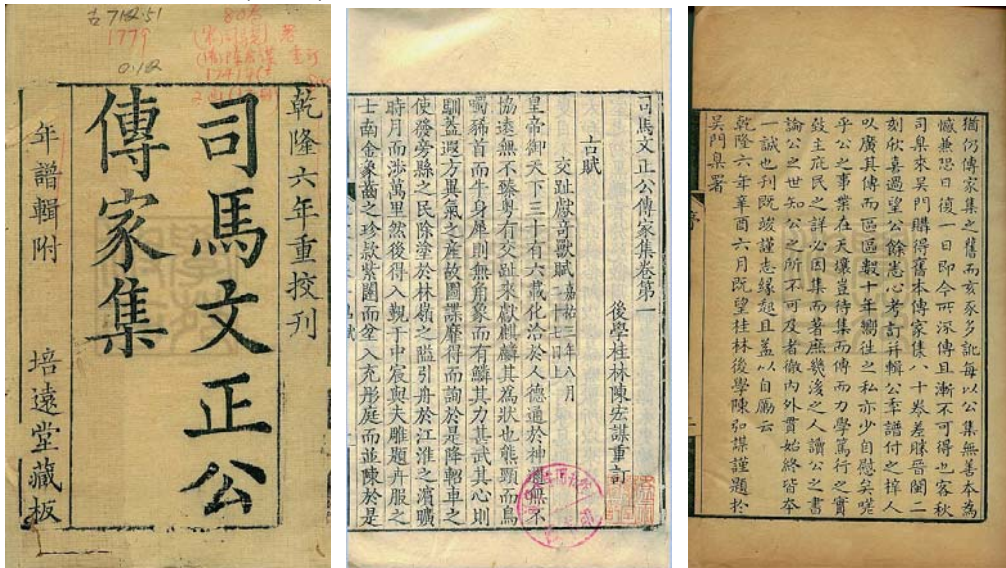
弘謀調天津後，不久，「(乾隆)五(1740)年，遷江蘇按察使。六(1741)年，遷江寧布政使，甫到官，擢甘肅巡撫，未行，調江西。」

他於江南省(江蘇省)任職間，蒐購舊刻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》，於蘇州重為校訂刊行。

乾隆六(1741)年陳氏序云：「客秋司臬來吳門，購得舊本《傳家集》八十卷，差勝晉、閩二刻，欣喜過望，公餘悉心考訂，並輯公《年譜》，付之梓人，



以廣其傳…乾隆六(1741)年辛酉六月既望後學陳弘謀僅題於吳門臬署。」



遼大館藏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》書影

以上署「培遠堂」之書，確為陳弘謀所看，其刊地於雲南、天津、蘇州皆有，由此或可知陳氏所刻書，與一般所稱某堂者不同，他僅是陳氏自號書齋，居無定所。

#### (四)考論其他諸書

瞿勉良又言陳氏其他著作，如稱「顧錫疇編《綱鑑正史約》36卷，自編《天章匯錄》不分卷(活字本)，自輯《大學衍義》6卷，又《大學衍義補輯要》12卷，…自撰《四書考輯要》20卷，又《培遠堂文檄偶存稿》48卷等」。筆者認為現存者皆非是陳氏所刻，而是書坊冒名刊印牟利者。蓋確為陳氏所刊之書，其署名多署「桂林後學陳弘謀」，而諸如《四書考輯要》則署「桂林陳宏謀榕門」，《大學衍義補》則作「粵西沈宏謀纂輯」，皆不合。至於陳氏後裔所刻《培遠堂全集》則非陳宏謀所刻明矣。

弘謀刻書史傳所未載，所見諸書或有依託陳氏之名而為。實際上，現所存陳氏所刻之書並不多，《近思錄集解》、《五種遺規》與《司馬文正公傳家集》而已，其餘或未存，或為書坊翻刻之本。陳所刻之書，多半是有裨政教，於雲南刻書亦兼以提振當地學風。這些書至其歿後，仍有翻印，尤其清末官書局亦翻印，可見其於政教之價值。其次，則與文獻流通、保存文獻。